

文史知识

研究古代文论点滴谈

略谈杜牧咏史诗

夏文化的发掘与夏王朝的建立

我国古代的裳和裙

发展变化中的唐五代官制

为什么说《玉树后庭花》是亡国之音

敏泽

缪钺

孟世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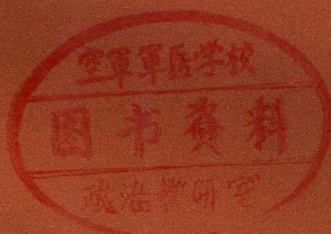
阎玉山

张国刚

祁和晖

1985

WENSHI ZHISHI



7

橫陳內則重闔
之畫開闔闔之
彷彿非崇嚴無
以備制度非巨

江上缺心手疊山
字畫填筆如雲
烟、耶、雲、部



医药学院610 2 01495542

文史知识

1985年第7期

(总第49期)

• 治学之道 •	研究古代文论点滴谈	敏 泽	3
• 文学史百题 •	略谈杜牧咏史诗	缪 钺	8
• 历史百题 •	夏文化的发掘与夏王朝的建立	孟世凯	14
• 怎样读 •	《淮南子》的文学特色	张啸虎	20
诗	真相与真魂(怎样欣赏古典诗词之二十)	臧克家	25
文	明霞散绮 金声玉振——读江淹《别赋》	李罗兰	29
欣	自然见深远 清淡蔚唐风——读张九龄《望月怀远》	张秀芝	35
赏	苏诗与气候	高泳源	38
• 文史书目答问 •	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——波斯史籍	刘迎胜	42
• 词学名词解释(12) •	摊破·添字	施蛰存	46
• 古典文学流派 •	但凭妙笔写真情——“性灵”诗派漫评	卢永璘	48
文化	夏代有文字吗	李先登	51
史	我国古代的裳和裙	阎玉山	53
知识	元代的军队	史卫民	58
电影《谭嗣同》	顾问朱家溍答客问	史 澄	63
人物春秋	汉末大名士——孔融	陶 易	66
	耶律楚材——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	谢 方	71
	才子袁枚育诗才	王英志	75

• 古文字学十二讲 •

第九讲 “小学”的宝藏

李学勤 80

•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(连载十八) •

发展变化中的唐五代官制〔一〕

杨志玖 张国刚 83

- 文史信息 • 列宁格勒藏抄本《石头记》即将出版(89)玻璃是国外传入的吗(90)怎样看待《水浒传》中宋江接受招安(90)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何以长期存在(90)英美对中国中世史的研究(91)
-

• 文史杂谈 • 说冯道

徐 逊 92

范仲淹和“庆历新政”

郭正忠 95

• 语言知识 • 释“毒”

戚燕平 99

成语 } 难兄难弟
典故 } 青白眼

李 夏 102

毛 祝 103

青年 } 论子贡“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”

唐任武 104

园地 } 冷香飞上诗句——试论姜夔词的特色

祁晓明 106

古代民族志 • 劲勇喜舞的蛮人

杨耀坤 109

• 书画欣赏 • 如何评价赵孟頫的书法

张公愚 112

• 文史信箱 • 为什么说《玉树后庭花》是亡国之音

祁和晖 115

• 文史研究动态 • 郑和下西洋研究综述

范金民 119

• 文史古迹 •

云水苍苍 江水泱泱——记严子陵钓台

赵明政 125

文史知识自测题答案

本刊编辑部 128

- 补白10则 北人学没(13) 曲端斩叔(19) 求人不如求己(41)
蜀鄙之僧(45) 我国古代的“沙盘”(57) 居则视其所亲(62) 南岐人之见(79) 进贤为贤(98) 景公居严(101) 谄事者戒(118)
-

赵孟頫书法选(封二) 严子陵钓台(封三)

研究古代文论点滴谈

敏 泽



敏泽，河南浉池县人，1926年生，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，任大百科全书卷编委、文学理论分支副主编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》(上、下)、《李贽及小说评点》、《清实录文化资料摘编》，以及有关古代文论、美学、当代文学的论文二百余篇。

书，虽然读了几十年，但自审所学，终属浅尝，只能勉强谈点粗浅体会。

我在学习上取径较宽。青年时期，学习过旧体诗文，及新诗、小说之类，也曾广泛地学习过苏联及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名著。五十年代中后期，主攻中国古代文论至今。为攻古文论，就要经常学习我国古代的历史、哲学、宗教等等，不如此，对古文论的研究，就很难有全面的理解。这已经比较宽泛了。而至今我也还在花一部分精力关心并撰写有关当代评论、理论、美学等方面的文章，并经常地阅读一些国外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。这样做，其弊是精力较分散，其利是视野较广阔。两相权衡，我以为利多于弊。微观之与宏观，乃相反而成。传统为学，经史子集兼攻，不划地为牢，局于一隅，实即今人所说打破各个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，诚有其有利于宏通的方面，确属必要。盖思想文化领域之各个学科，总而名之曰意识形态，条缕割析，固可为各个学科，但又互相渗透，互为影响，不能完全割裂。分工过细，固易专攻，收效较快，但其弊因之而生：视野狭小，容易流於偏颇。近年来，西方人文学科趋向于总体研究、系统研究、比较研究等等，意即在于打破此等藩篱。且今之与古，外之与中，虽有时间之

殊。地域之别，但诗心、文心规律之一般性，却诸多玄同。研究古文论，并非惟古是尚，立足点还在于今：将这份丰富遗产经过科学之整理，贡献于世界文化之宝库，同时还可以为我国的文学理论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，因此，知古而不知今，无疑将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局限。例如，文学理论界几年前关于文学对象的争论，颇为热烈，于此留心，即可以启发对于古文论的研究。距今两千多年《汉书·翼奉传》中已经明确提出，“诗之为学，情性而已”，这个提法实比后世高尔基所说的“文学是‘人学’”早得多，也精辟得多。因为“人学”可以是社会学、医学、心理学等等，惟独表现人之思想感情，属于文学艺术唯一的特点。又如，几年前关于意识流的争论颇为热烈，论者认为其特点是打破了时空之界限。考之我国古文论，例如陆机《文赋》所言“观古今于须臾，抚四海于一瞬”，刘勰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所言“寂然凝虑，思接千载，悄然动容，视通万里”，朱熹所说“虽千万里之遥，千百世之上，一念才发，便到那里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十八）等等，皆属思维、想像，从来不存在时空限制，也不可能有所谓限制。足见其立论之偏，并不全面。再如，文学理论讲理念化，每每所举，不外“席勒化”，类似教训，古文论中何尝乏此？且不讲“诗必柱下之旨归，赋乃漆园之义疏”（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）那类玄言诗，宋代理学家将诗歌变为“语录讲义之押韵者”（刘克庄《吴恕斋诗稿跋》），宋人真德秀、元人金履祥、清人蔡世远等执理为诗，更是如此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〈古文雅正〉》提要中说：他们选诗“持论一准于理，而藏弃之家，但充插架，固无人起而攻之，亦无人起而习之”，同书《濂洛风雅》（金履祥编）提要也说：“自履祥是编出，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。……然而天下学为诗者，终宗李、杜，不宗濂、洛也。此其故，可深长思矣。”这类例子，不胜枚举。可见，研究古文论，当于古文论本身深下工夫，自不待言；而关心当代，也无疑会给古文论研究以启发（反之，亦然）。何况古文论研究，固然应该继承前贤往哲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，但方法上也确实需要随时代之前进不断更新和开拓。今日西方流行的种种新研究方法，有人统称之为“科学方法”，自不妥当，但其中的合理因素，无疑也应该汲取和借鉴，以便用新的观点方法给古文论以新

的科学解释。例如传统所言“文气”，用传统语言、概念解释，就很难说清。而用新的科学的语言表征，则很易使读者了解。所谓“文气”，实即为文者临文时之精神心理状态。精神心理状态昂扬——即气盛，则言之高下低昂咸宜，文章容易写得生机勃勃；反之，则很容易写得如同枯木，缺乏生机。再如《文赋》所云“兴会”，实即今人所说“灵感”；“气韵”，即“生动”，亦即文章应如活泼之人那样，具有生机；“作者用一致之思，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”，“人情之游也无涯，各以其情遇，斯所贵于有诗。”（王夫之《薑斋诗话》）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，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”（谭献《复堂词录序》）等，与近年来德国兴起的“接受美学”，实属同旨。当然，这类解释，应充分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，不是贴标签，强行比附，而是给它以科学的、符合古人原意的新解释。这方面，须待我们细心辨析的工作是很多的。而要用新的科学方法和概念给古文论以新的解释，知古昧今，实亦划地为牢，是很难做到的。当今年轻一代中，锐意革新研究方法者，颇为不少，自堪嘉许，但也有脚跟并未站稳，于古并未真懂，急于开拓新的研究方法，以致弄得歧义百出，则又实可忧虑。例如，一篇文章将中国古文论之“中和之美”与亚里斯多德之 Katharsis（即通常译作“净化”和“宣泄”）比较，却将“中和之美”更名为“发和说”，舍“中”取“和”，殊不知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，舍“中”即舍弃了“中和之美”之“大本”。这类情况，则又应该引以为戒。

为学应有广博的蓄积，要如清人魏叔子所说那样：“辟之富人积财，金玉、布帛、竹头、木屑、粪土之属，无不豫贮，初不必有所用之”，而“蓄积”多了，“酝酿”、“沈浸”久了，“及其有故临文”，才会“大小浅深，各以类触，沛乎若决陡池之不可御”。而“粪土之用，有时与金玉同功”（《魏叔子文集》卷六《答施愚山侍读书》）。此说甚是。我平日读书，也力本此旨，广加搜纳，中国的、外国的、古代的、现当代的有关资料，无不“豫贮”。例如，由于佛教和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学理论关系密切，不仅应尽量多读点佛教典籍，史籍、笔记中的有关资料，如唐人韦述《两京新记》中关于唐西安佛教寺院设立的详细记载，宋人笔记中关于菩萨塑像由男变女的记载等等，而且一一记录，以备采用。

积少成多，累腋为裘。尝读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于六朝释氏文，以及有关当时雕塑的记叙中，不时有“形象”一词出现，始未注意，后来发现此类语汇不时出现，遂留采撷，所得颇为不少，仔细加以研究，才发现佛教输入我国后，在建立寺院的同时，广建佛像，以像为教，故亦称为“像教”。既以像为教，则“像”之制作雕塑是否给人以美感，就至关紧要。可见“形象”一词是佛教输入后人们对佛像雕塑进行评价所使用的语汇，和前此我国古文论中偶见之“形相”一词用法各异，含义不同，并渐及于文学艺术。实即启迪了对艺术形象问题的认识。这就是拙著《魏晋至唐关于艺术形象的问题——兼论佛学输入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》（《文学评论》1980年第1期），提出的一个前人未曾提及的问题。文章发表后，受到了许多时贤的鼓励。又如，自“五四”以来，西方意象主义（imagism）理论介绍到中国后，前辈学者一直认为“意象”一词来自异域，禹域之内从无这类理论。我在读明清笔记及诗文论著中，开始遇到“意象”问题，其始也未注意，后来越积越多，才逐步发现并肯定“意象”问题，其实是明、清人在探讨文学创作时一种十分自觉的认识，并由此上溯至唐宋，再至魏晋，至先秦，清理其脉理源流，这就是拙著《中国古典意象论》（《文艺研究》1983年第3期）的成因，推翻了“五四”以来的一个公认的论断。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，就不可能提出这类问题来。学术研究是科学，科学就需要科学的态度，既不能向壁虚拟，也不能凌空蹈虚，而只能靠艰苦的长年累月的积累。离开艰辛的劳动、“积财”，又只能是“缘木求鱼”。《易·系词上》曾说：“引而申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”对于为学，确属千古不刊之论。“触类而长”，首先就需要有“类”可“触”，家徒四壁，就无“类”可“触”。对于创作来说，丰富的联想和想像来自于丰富的生活积累；对于学术研究来说，丰富的联想力，或“触类而长”的能力，则来自于丰厚的知识积累，没有此等积累，那联想就折断了翅膀，失却了驰骋的余地。

上面我着重讲了厚积、广积对于为学的重要性，这特别是针对当前研究工作取径过狭、过小而言；皓首穷经，眼睛只盯着一点，于此有关的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、前前后后，概不搜览研究，这是不会有

大作为的。但广泛积累，以至知识渊博，未必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学者。对于为学来说，需要广积，也还需要善于熔炼、吸收和消化，弃粗取精，不然就难免有两脚书厨之讥。清人魏叔子所说：“金百炼则杂气尽而精光发”，“譬犹治水者，沮洳去则波流大，熬火者，秽杂除而光明盛也。”（《答施愚山侍读书》），讲的正是这个道理。只有广积，没有精炼，最多只能为恒钉，而不能发前人之所未发。学术研究的目的，却正在于此：发前人之未发，或前人已有发掘，而我之开掘更深、更广、更多，并不在于陈陈相因，或转述早已公认的结论。这也就是陈寅恪先生在《〈突厥通考〉序》所言：“仅守老子损而又损之义。”“损而又损”，即反复精炼，去杂去秽，由博返约。必博约相济，并善于由博返约。此二者诚不可或缺。

至于为学需要勤奋，这自不待言。不仅为学如此，在任何一个领域中，要想多少有点成就和贡献，都不能例外。长跑运动员要比别人达到的成绩时间上缩短一秒，跳高运动员要比别人达到的高度提高一厘米，不知要付出多少辛劳和汗水。学术研究同此。达到别人已经达到的成功已属不易，有所前进、有所突破更难。要想做到这一点，方法对，路子正，固然重要，但首要的是勤奋，没有辛勤的劳动、耕耘，其它一切都将付诸东流。时间对于世间每个人都是公正的：每天二十四小时。但善于利用者与不善于利用者之差别，判若霄壤。古人云：有所不为而后有为。“不为”，即牺牲，只有牺牲掉一切于学术事业无关之事，精力专注，不为外界各种纷扰所引诱，所困扰，心若枯井，长年累月地甘于寂寞，坐得稳冷板凳，才能在学术上有所作为。名势权位这一类炙手可热之事，要尽量排斥得远些。眼向学术而心热名利锁，不会有真正的成就。犹之于《红楼梦》第一回《好了歌》中所言：“人人都说神仙好”，“只有”这个那个“忘不了”，“忘不了”就不会专心致志，也不可能有所成就。

以上所说，与其说是体会，毋宁说是心向往之，更为确切。愿与青年朋友同勉共进。

略谈杜牧咏史诗

缪
钊

咏史之诗，自古有之。诗人借咏史抒发自己的怀抱，以古人自况；或对前人往事进行评议褒贬，借以表示对今人今事的称颂与讽刺，这也是一种广义的比兴之法。萧统选辑《文选》，在“诗”的分类中，特立“咏史”一目。左思、陶渊明、颜延之都有许多咏史名篇，此后作者，代不乏人。

到晚唐时，以绝句诗体咏史之风特盛。杜牧、李商隐也都喜欢用绝句体作咏史诗，并为后世所传诵。杜牧生平所作咏史题材的诗二十余首，其中用七绝体者占五分之三。

杜牧为人豪壮刚直，有治国安民的抱负，慷慨论天下事。他生当晚唐多事之秋，主张削平藩镇、加强统一、抵抗侵扰、巩固边防、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，“生人但眠食，寿域富农桑”（《樊川文集》卷一《郡斋独酌》）。他在评论世事时，称赞挺节不屈，鄙视忍辱偷生，抨击腐朽政治，怀念致治贤臣，这些思想也都在他的七绝咏史诗中表现出来。

绝句体每首只有四句，容量很小，难以尽情抒写，这就需要有一种“妙用”，要“取径贵深曲，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，正面不写写反面，本面不写写对面、旁面，须如睹影知竿乃妙”（刘熙载《艺概》卷二）。杜牧当然是善于掌握这一妙用的。抒情写景的绝句诗，能做到情韵幽邈，含蕴无尽，有一唱三叹之音，这固然是杜牧所擅长的。但是咏史诗既要发扬议论，进行褒贬，又要求含蓄蕴藉，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下边我们举例讨论。

杜牧《题桃花夫人庙》（原注：“即息夫人。”）：

细腰宫里露桃新，脉脉无言度几春？

至竟息亡缘底事？可怜金谷堕楼人。

桃花夫人庙在唐黄陂县境。黄陂是黄州的属县，此诗大概是杜牧于武宗会昌中为黄州刺史时所作。据《左传》（庄公十四年）记载，楚王听说息国（今河南息县）君主的夫人很美，遂发兵灭息，把息夫人抢了回来。息夫人忍辱顺从楚王，生了两个儿子，而一直不说话。楚王问她，她说：“吾一妇人，而事二夫，纵弗能死，其又奚言？”对于息夫人这种忍辱偷生者，杜牧当然是不满意的，但是诗中并不明言谴责，而是先问一句“至竟息亡缘底事”！到底息国灭亡是为了什么事呢？言外之意是说，岂不是因为楚王要抢你息夫人吗？下面并不明言责备息夫人赧颜事仇，而说：“可怜金谷堕楼人”，用绿珠事作一对比。绿珠是西晋石崇的爱妾，八王之乱时，孙秀倚仗赵王伦的势力，派兵到石崇住的金谷园，强索绿珠。绿珠立即堕楼而死，表现了不肯屈从强暴的劲节。绿珠与息夫人在同样的处境中而表现各异，成为鲜明的对照。杜牧诗用这种巧妙的艺术手法谴责息夫人，寓褒贬议论于含蓄蕴藉的诗味之中，发挥了绝句诗体的妙用。

在盛唐时，王维也作过一首咏息夫人的诗，诗云：“莫以今时宠，宁忘昔日恩？看花满眼泪，不共楚王言。”这首诗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作的。据孟棻《本事诗》“情感”篇记载，宁王看见其宅旁卖饼师之妻很美，强夺之，很宠爱。过了一年，宁王问她：“你还想念饼师吗？”饼师妻默然。宁王召饼师使见之，“其妻注视，双泪垂颊”。这时座客十余人，无不凄异。宁王命赋诗，王维遂作成此首。后世论者或以为这首诗“更不著判断一语，此盛唐所以为高”（王士禛《渔洋诗话》）。我认为，这一评论未免有点空泛，未能结合当时作诗的实际。作咏史诗以唱叹出之，不著判断语，固然是高格，但是王维当时在宁王面前，借咏息夫人以写饼师妻的哀怨，只能以含蓄出之，既表示了对饼师妻的同情，而又不伤及宁王。清初邓汉仪也作过一首《题息夫人庙》诗，并且是次杜牧诗的原韵。其诗云：“楚宫慵扫黛眉新，只自无言对暮春。千古艰难惟一死，伤心岂独息夫人？”这又是一种写法，他用婉曲之笔，借息夫人事以慨叹那些明朝遗臣被迫仕清而心怀内疚者（如吴梅村），有惋惜亦有谴责，与杜牧诗的写法又不同。由此可见，同一题材，诗人在不同情况下可有不同的写法，读者亦不可拘泥求之。

杜牧又有一首《金谷园》诗，就是歌咏绿珠的，诗云：

繁华事散逐香尘，流水无情草自春，

日暮东风怨啼鸟，落花犹似堕楼人。

金谷园在洛阳西北，杜牧游金谷园故址而作此诗。因看见落花而联想到绿珠之堕楼，隐喻惋惜与赞叹之意，情韵悠然。

《赤壁》是杜牧咏史诗中最脍炙人口者。诗云：

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

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

三国时古战场的赤壁在今湖北蒲圻县，与乌林隔江相对（黄州也有一个赤壁，不过并非古战场的赤壁）。杜牧善论兵，自负有军事才能，而不得一试，这首诗有借题发挥之意。宋许颢《彦周诗话》评论此诗说：“孙氏霸业，系此一战。社稷存亡，生灵涂炭，都不问，只恐捉了二乔，可见措大不识好恶。”这个意见未免太迂腐了，完全不理解作诗的妙法，所以后人驳难者甚多。何文焕《历代诗话考索》说：“诗人之词微以婉，不可论言直遂也。牧之之意，正谓幸而成功，几乎家国不保，彦周未免错会。”冯集梧《樊川诗集注》也说，许彦周是“村学究读史见识，岂足以语言近旨远之故乎？”杜牧诗中不直说孙氏灭亡而说“铜雀春深锁二乔”，借用具体情事与形象以达意，正是诗人的匠心所在。

吴景旭《历代诗话》庚集引《深雪偶谈》之说，认为，杜牧诗如《四皓庙》、《乌江亭》，不如《赤壁》诗“东风”、“春深”数字“较为含蓄深窈”。下边我们便看看这两首诗：

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。

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（《题乌江亭》）

吕氏强梁嗣子柔，我于天性岂恩仇。

南军不袒左边袖，四老安刘是灭刘。（《题商山四皓庙一绝》）

这两首诗都是标新立异，作翻案语，但所论未合情理，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》卷十五已经指出这一点，他说：“项氏以八千人渡江，败亡之余，无一还者，其失人心为甚，谁肯复附之？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。”至于诗艺，亦不高明，直率浅露，无酝藉之味，也就不如《赤壁》

诗。

杜牧还作过歌咏本朝史事的诗，更有现实意义。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就是《过华清宫绝句三首》之一：

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。

一骑（巾）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

唐玄宗宠爱杨贵妃，“贵妃生于蜀，好食荔枝，故每岁飞驰以进”（李肇《国史补》卷上）。当时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，人马僵毙，相望于道”（谢枋得《注解选唐诗》卷三）。这首诗就是以婉而多讽之笔指出唐玄宗“致远物以悦妇人，穷人之力，绝人之命，有所不顾”（同上）。

又有一首《题魏文贞》诗，歌颂励精图治的唐太宗、魏征，而谴责见识短浅的封德彝。诗云：

螭蛄宁与雪霜期？贤哲难教俗士知。

可怜贞观太平后，天且不留封德彝。

据《新唐书·魏征传》记载，在贞观初年，唐太宗尝叹曰：“今大乱之后，其难治乎？”魏征说：“大乱之易治，譬如饥人之易食也。”他劝太宗励精图治，说：“圣哲之治，其应如响，期月而可，盖不其难。”封德彝说，三代之后，浇诡日滋，天下就难治了，秦汉都没有治好。“征书生，好虚论，徒乱国家，不可听。”唐太宗不听封德彝之言，采纳了魏征的意见，努力改善政治，后来果然天下大治，“户阖不闭，行旅不齎粮，取给于道。”这时封德彝已经死了。唐太宗对群臣说：“此征劝我行仁义，既效矣，惜不令封德彝见之。”杜牧是有经邦济世之志的，所以赞扬唐太宗、魏征这样励精图治、有进取心、能致太平的君臣，而谴责封德彝这样保守思想严重、因循守旧不求进取的人，把他比做“不知春秋”的螭蛄。

杜牧还有一些登览抒情而隐含咏史的诗篇，如《登乐游原》：

长空澹澹孤鸟没，万古销沉向此中。

看取汉家何事业，五陵无树起秋风。

乐游原在长安城南，地势高敞，便于游览。“五陵”指西汉皇帝诸陵，如高帝长陵、惠帝安陵、景帝阳陵、武帝茂陵、昭帝平陵等。这些陵墓后来大都被发掘了。诗中慨叹汉朝当时虽然强盛，而世异时移，陵

墓荒废，“树树起秋风，已不堪回首，况于无树耶？”（沈德潜语，见《唐诗别裁》）杜牧生当晚唐没落时期，颇有借古慨今之意。这类咏古诗，感慨兴废，不拘于一人一事，故更为豪宕开阔，有远韵远神。

在晚唐时与杜牧齐名的李商隐也喜欢用七绝作咏史诗。因为二人诗的风格不同，杜牧豪迈俊爽，李商隐深隐酝藉，所以李商隐的咏史诗比杜牧更为婉曲幽邈，需要细心体会。我想，比较研究一下，也是很有趣味的，兹举两首为例，加以说明。

李商隐《贾生》诗：

宣室求贤访逐臣，贾生才调更无伦。

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

贾谊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，绛侯周勃、灌婴等武夫不能了解贾谊而加以排挤，固无足怪；汉文帝是相当能欣赏贾谊的，在贾谊迁谪长沙四年之后，召回长安，在宣室接见他，同他谈话，很感兴趣，至夜半，文帝为之前席，并且说，自以为不及。从表面看来，文帝似乎很能赏识贾谊了，但是可惜他所问的并不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，而只是问鬼神之事，这并不能考见贾生的真实才能。李商隐就此发议，寓意甚为沉痛。李商隐平生也曾遇到过能表面上欣赏他的人，但是真正的知己还是难逢的。短短四句，借古伤今，用意深曲，情韵幽窈，的确是一篇佳作。张孟劬（采田）先生《玉谿生年谱会笺》卷三解释此诗说：“此刺牛党也。”认为自武宗崩，宣宗立，凡从前党人见逐于李德裕者，无不一一召还。乃不能佐君治安，专以倾陷李德裕为事，借枯骨已寒的吴湘之狱，重翻旧案，又岂宣室求贤之本意哉？按张先生认为李商隐此诗是借咏史以讽刺当时某人某事者，这也是唐代诗人惯用的艺术手法，可备一说。

又有一首《读任彦升碑》诗：

任昉当年有美名，可怜才调最纵横。

梁台初建应惆怅，不得萧公作骑（jì）兵。

冯浩《玉谿生诗笺注》卷四引程梦星说，认为此诗以梁台初建比令狐绹为相。张孟劬先生也同意此说（《玉谿生年谱会笺》卷四）。据《梁书·任昉传》，在南齐时，萧衍与任昉同在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为宾友，时

相过从，萧衍曾对任昉说：“我登三府（按，指三公），当以卿为记室。”任昉亦戏对萧衍说：“我若登三事（按，亦指三公），当以卿为骑兵。”因为萧衍善于骑射，故为此戏语。后来南齐和帝中兴二年（502），萧衍为相国，封梁公，旋即进爵为梁王，他任命任昉为记室。这时任昉当然不能再想把萧衍作“骑兵”了。李商隐少时受知于令狐楚，与令狐楚之子绹过从亲密。宣宗大中四年，令狐绹拜相，而李商隐仍沉沦下僚，今昔对比，不胜感慨，故借萧衍、任昉事为喻而赋此诗。令狐绹不学无术，温庭筠曾讥讽他为“中书堂里坐将军”，而居然高居相位，李商隐虽然“才调纵横”，而仕宦不偶，此四句诗中隐寓抑塞不平之意。

综观以上两诗，可见李商隐论史绝句的运思用笔与杜牧不同，而各有特长，两人可谓异曲同工也。

北 人 学 没

南方多没人，日与水居也，七岁而能涉，十岁而能浮，十五而能没矣。夫没者岂苟然哉？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，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。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。故北方之勇者，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，以其言试之河，未有不溺者也。

——苏轼《东坡全集·日喻》

〔译文〕南方有很多会潜水的人，他们整天和江河湖海接触，七岁就能涉水，十岁就会游泳，到十五岁便会潜水了。他们成为潜水能手难道是偶然的吗？不是，而必定是粗识水性孩子，成天和江河接触，那么，十五岁就能掌握潜水的规律了。出生以后没有见过江河的人，成年后看见船也害怕。所以北方的鲁莽汉子，向南方的潜水者请教了潜水技巧，再照潜水者所说的话跳进河水里去试验，那没有不被淹死的。

（高明）

夏文化的发掘与夏王朝的建立

孟世凯

我国进入文明社会，始于大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建立的夏王朝。这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公认。然而，对于这个存在了近五百年的王朝的历史，人们却所知甚少。早在二千多年前，孔子就说过“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”，原因是“文献不足故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。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文献仍然不足。先秦文献中，如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竹书纪年》、《世本》、先秦诸子著作、金文、《楚辞·天问》等仅保存着片断而零星的夏代史料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中除去禹平治水土的活动外，其它史实也很少。于是，曾经有人怀疑夏王朝的存在，或说禹只不过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史学界在五十年代初开始了对夏代历史的全面探索。三十多年来，考古工作者根据文献记载提供的线索，在山西南部 and 河南西部作了大量调查和发掘，获得了有关夏文化的许多重要资料。多数学者认为，夏人早期活动中心在这两个地区是没有多大问题的。但夏既建国，就该有国都，它的国都在何处呢？《史记·夏本纪》《集解》引皇甫谧曰：“都平阳，或在安邑，或在晋阳。”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《正义》引《世本》：“夏禹都阳城，避商均也。又都平阳，或在安邑，或在晋阳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，《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夏居河南，初在阳城，后居阳翟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颍川郡阳翟县条，注引应劭曰：“夏禹都也。”而颜师古在注中又反驳应劭，说阳翟原是禹的封地，并非禹的国都……凡此种种，莫衷一是。但上面所述倒是都在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，古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告城镇，平阳在今山西临汾西南，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，晋阳在山西太原市南晋源镇，阳翟在今河南禹县，与发现的夏文化中心区域地望一致。古书中还有“夏墟”、“大夏”、“东

夏”、“帝丘”等地名，有的是夏建国后之地，有的非禹所都，到底禹都何处，还有待进一步探求。不过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在登封告城镇北侧找到了春秋、战国、汉至唐代连续使用的阳城城垣遗址。在出土的战国陶器上有“阳城”、“阳城仓器”的陶文戳记。并且在告城镇西一里的颍河北岸和五淩河西岸的台地上，发现了龙山文化中晚期的一个小城堡遗址，这就是著名的王城岗遗址。在夯土房基下埋有人骨架，可能是用来“奠基”的牺牲品；在第四期的灰坑内还出土了一块青铜容器的残片。据测定，这个城堡遗址距今约四千年左右，略当于夏初时代。城堡虽然不算大，但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城堡之一。有的学者认为，它可能是夏禹所都的古阳城遗址。

河南西部还有两个重要的文化遗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一是偃师的二里头遗址，其内涵被称为“二里头文化”。遗址的文化层分为四期。有的学者认为，夏文化应是河南龙山晚期文化和二里头一、二期文化；有的认为只有二里头一、二期文化才是夏文化；有的认为整个二里头四期都属夏文化。据测定，其一期距今约三千九百年左右，因此有人认为此期属夏初遗址。其第三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个大面积的殿堂基址，有人推测这可能是夏建国后的一座都城遗址。但也有人认为即便这是夏文化遗址，也是夏代中期的遗址。

另一个是河南临汝的煤山遗址。遗址有三个文化层：一期为河南龙山晚期文化，二期相当于二里头一期，三期相当于二里头二期。测定的年代数据有两个，一是距今四千年左右，一是距今四千二百年左右。从时间上看，一期属于夏代早期文化。

在禹县的瓦店、洛阳的姁李、密县的新岩、登封的程窑等地，也发现过一些河南龙山晚期文化和二里头类型的文化遗址。这些都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遗存。

在山西汾水流域也发现和发掘了一些文化遗址，其中有两处遗址为众所瞩目。一是夏县的东下冯，发现一座城址的遗迹，属二里头类型文化，距今约三千八百年来到三千九百年左右，可能是夏代中期遗址。另一个是襄汾县的陶寺，属龙山晚期文化，这一遗址的文化延续了五百年左右，早期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，晚期距今四千年左右。陶寺文